


思想與社會  
Logos & Polis

韦伯作品集



# 论俄国革命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潘建雷 何雯雯 译

 上海三联书店

# 论俄国革命

[德] 马克斯·韦伯 著 潘建雷 何雯雯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俄国革命/(德)韦伯著;潘建雷,何雯雯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7

(思想与社会)

ISBN 978-7-5426-3288-3

I. ①论… II. ①韦…②潘…③何… III. 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文集 IV. ①D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4050 号

## 论俄国革命

著 者 / [德] 马克斯·韦伯

译 者 / 潘建雷 何雯雯

责任编辑 / 黄 韬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任中伟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mailto: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40×960 1/16

字 数 / 250 千字

印 张 / 20.5

书 号 / ISBN 978-7-5426-3288-3/C·364

定 价 / 39.00 元

封面图片

弗·亚·瓦西里耶夫,《拉多加湖畔·多云天》,1867

## 论俄国革命

---

## 总 序

λόγος和πόλις是古代希腊人理解人的自然的两个出发点。人要活着,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在共同体中,人不仅能活下来,还能活得好;而在所有共同体中,城邦最重要,因为城邦规定的不是一时的好处,而是人整个生活的好坏;人只有在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成全人的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政治的动物。然而,所有人天性上都想要知道,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人要活得好,不仅要过得好,还要看到这种好;人要知道他的生活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要讲出好的道理;于是,政治共同体对人的整个生活的规定,必然指向这种生活方式的根基和目的,要求理解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秩序的本原。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讲理的动物。自从古代希腊以来,人生活的基本共同体经历了从“城邦”(πόλις)到“社会”(societas)与现代“国家”(stato)的不同形式;伴随这种转变,人理解和表达自身生活的理性也先后面对“自然”(φύσις)、“上帝”(deus)与“我思”(cogito)的不同困难。然而,思想与社会,作为人的根本处境的双重规定,始终是人的幸福生活不可逃避的问题。

不过,在希腊人看来,人的这种命运,并非所有人的命运。野蛮人,不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正确地说话,讲不出他们生活的道理。政治和理性作为人的处境的双重规定,通过特殊的政治生活与其道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微妙张力,恰恰构成了西方传统的根本动力,是西方的历史命运。当西方的历史命运成为现代性的传统,这个共同体为自己生活讲出的道理,逐渐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在它的道理面前衡量他们生活的好坏。幻想包容越来越多的社会的思想,注定是越来越少的生活。在将越来越多的生活变

成尾随者时，自身也成了尾随者。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在思想和社会上，面临着摧毁自身传统的危险。现代中国在思想和社会上的困境，正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的处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渗透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社会中的这一西方历史命运。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时担负着西方历史命运的外来危险和自身历史传统的内在困难。一旦我们惧怕正视自己的命运带来的不安，到别人的命运中去寻求安全，或者当我们躲进自己的历史，回避我们的现在要面对的危险，听不见自己传统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我们手中，两个传统就同时荒废了。社会敌视思想，思想藐视社会，好还是不好，成了我们活着无法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尾随西方的历史命运，让它成为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必须让它成为我们造就自己历史命运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想窒息自身的历史传统，让它只停留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就需要借助另一个传统，思考我们自身的困难，面对我们现在的危机，从而造就中国人的历史命运。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这个社会的生活之中仍然活着的，仍然说话的传统。《思想与社会》丛书的使命，就是召唤我们的两个传统，让它们重新开口说话，用我们的话来说，面对我们说话，为我们说话。传统是希腊的鬼魂，要靠活的血来喂养，才能说话。否则海伦的美也不过是沉默的幻影。而中国思想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血气，滋养我们的传统，让它们重新讲出我们生活的道理。“始终惟一，时乃日新。”只有日新的传统，才有止于至善的生活。《思想与社会》丛书，是正在形成的现代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它要造就活的思想，和活着的中国人一起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 中译者说明

戈登·威尔斯与彼得·巴赫两位学者,经过数年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于1995年完成了马克斯·韦伯《论俄国革命》的编译工作。这项工作的难度令无数同仁望而却步,所以他们的贡献也不言而喻了。这里我们只就这本书的来龙去脉做一点简要的介绍。

1974年,欧美学术界成立了以霍斯特·拜尔、芮纳·李普瑟斯、沃尔夫纲·蒙森、沃尔夫纲·施路赫特、尤哈纳斯·维克尔曼等人为核心的学术委员会,负责编辑出版《马克斯·韦伯全集》。出版活动受到德国研究协会(DFG)的财政支持,巴伐利亚科学院、莱默斯基金会(Werner-Reimers-Stiftung)与Mohr Siebeck出版社协助出版,精力财力的投入难有与之比肩者。《全集》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著作和演讲,第二部分是书信,第三部分是课堂讲义,预计总共超过30卷,目前尚未全部完成。

戈登·威尔斯与彼得·巴赫从《全集》的第10卷与15卷选取了关于1905年与1917年俄国革命的文章,汇集成这本《论俄国革命》。这里译者必须就“题名”说明一点,严格地讲,按韦伯的原意,本书名译成“俄国革命”更为合适。这并非译者咬文嚼字,若就严谨的文体而论,的确应当去掉“论”字,因为韦伯本人以为自己的作品只是“编年纪实”。但是,考虑到韦伯的作品不仅“传事”,也传了“义”,译者自作主张给本书加了一个论字,不周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本书各篇文章的情况大致如下:《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与《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可以在马克斯·韦伯的《1905年的俄国革命》一书中找到,它们分别收录在《论文集与讲演:1905年—1912年》这一卷的第86—279页,第293—679页,这是《马克斯·韦伯全集》第10卷。



这两篇论文最初是作为《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1906年的增刊发表,分别载于第22卷与第23卷。

《俄国向伪民主的转变》与《俄国革命与和平》(=“Die russische Revolution und der Friede”)在马克斯·韦伯的《世界战争中的政治》一书可以找到,收录在《论文集与讲演:1914年—1918年》这一卷的第238—260页,第291—297页,这是《马克斯·韦伯全集》第15卷(MWG I/15,Tübingen,J. C. B. Mohr[Paul Siebeck],1984),这一卷是由沃尔夫纲·蒙森和冈国夫·胡宾根(Gangolf Hübinger)共同编注的。《伪民主》最初发表在弗里德里希·瑙曼的周刊《救助》第23期上(23[17],1917年4月26日);《俄国革命与和平》最初发表在《海德堡日报》第241期晚间版上(1917年5月12日)。

1917年的论文(《俄国向伪民主的转变》与《俄国革命与和平》)是以完整的样式呈现给读者的;1905—1906年的论文(《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与《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则经过英译者的裁减,大约省略了原文一半稍多的内容,这些英译者在编者导言中都作了交代,这里就不多谈了,只待读者自己去品评。

本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渠敬东老师若干年前交待给我的任务,中间多有耽搁,也修改了三次。然则译书无止境,今天翻来看,几乎每一页都能读到不妥之处,将来若有机会订正,再好不过;若有行家里手能重译,本书也算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也不枉辛苦一场。译书中间得到了同窗马强、俄语系某师姐(竟忘记了人家的名字,实在抱歉)、北大未名俄语系某同学(通过网络认识,三年后不记得其姓名,抱歉之至),最重要的是,得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正教研究专家徐凤林老师的帮助,让我省却了俄文翻译的痛苦。当然,本书是我个人最后统稿,所有错误系我一人负责。

潘建雷

北京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

# 目 录

中译者说明	1
编者导言	1
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	49
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	170
俄国向伪民主的转变	272
俄国革命与和平	294
党派和协会列表	301
术语表	304
参考文献	312

# 编者导言

1905 年秋, 马克斯·韦伯开始从事一项事业, 这项事业即使按韦伯本人的严格标准来看, 也是苛刻和勇敢无畏的。俄国发生的革命着实让韦伯感兴趣, 但德国报界关于革命的鄙夷和不友好的报道却让他感到失望, 于是韦伯开始撰写他自己关于这场危机的“编年史”。这里译出的《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Bourgeois Democracy in Russia, 以下简称 BD) 与《俄国向伪立宪主义的转变》(Russia's Transition to Pseudo-constitutionalism, 以下简称 PC) 等论文就是这项事业的部分成果。除涉及大量其他的事件外, 这两篇论文还着重考察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前景与徒有其表的立宪, 正是独裁制 (autocracy) 一手造成了这种徒有其表, 其目的是为了遏制公民自由和议会改革。

这两篇论文在很多方面值得称道, 尤其是它们的成稿更令人赞叹: 在那个令人眩晕的时期<sup>1</sup>, 政党纲领与宪法方案如雪片般飞扬, 让人应接不暇、不明所以, 而韦伯仅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就学会了足够多的俄语, 能够剖析、剥离这些幻象。我们必须认识到, 韦伯的研究包含大量的细节, 这并不是想让读者在疑惑中摇摆不定。韦伯论文的主要目的是让读者了解情况, 而不是娱乐, 他的一丝不苟使得文章有了一种平淡乏味的风格, 这种风格常常是费劲的、晦涩难懂的。作为一种补偿, 韦伯的论文也有一些特别激动人心的段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

是,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一文中长篇的慷慨陈词。这篇慷慨陈词的主题是,在生态学意义上萎缩的、官僚制支配的世界里,个人自由的斗争问题。韦伯对这一幕戏剧的某些关键特征的刻画可谓入木三分,对“坚如磐石的理想、永不衰竭的活力、涌动的希望此起彼伏,还有,他们深陷斗争的迷雾,体会到的撕心裂肺般的失望”(PC:231)的叙述更是抑扬顿挫,韦伯的这些刻画和叙述直接针对同时代的现实政治家<sup>2</sup> (realpoliticker),它们也会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韦伯 1905—1906 年撰写的两篇关于俄国的论文包含大量的论题,下文我们会就其中一些进行论述。同时这两篇论文也怀着韦伯的特殊心态,即理想主义者的自由主义困境引起了韦伯的同情,也得到了他的支持。韦伯是一个自由派,尽管其自由信念独辟蹊径<sup>2</sup>,同时他也是一个坚定的德意志民族主义者;这一点很好地解释了弥漫于韦伯另外两篇关于俄国论文中的迥异气氛,那两篇论文写于 1917 年,也收入了本书。在 1905—1906 年,各种自由主义势力在俄国正为他们的生存而斗争,韦伯自己的自由信念也和他们的信念产生了共鸣,他们的奋斗饱含英雄式的悲悯,这种悲悯也令韦伯感动不已。对公民正义、法治以及自由的关注超越了可能的地缘政治的影响,以至于一切俄国的重大变化都好像发生在他的祖国一样。然而,到 1917 年,欧洲的政治地理版图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现在是德国自己在为生存而斗争——而俄国正是德国的敌人之一。相应地,在《俄国向伪民主的转变》(以下简称 PD)和《俄国革命与和平》(以下简称 P)中,他看待俄国的切入点都弥漫着爱国主义,在应对策略上也是防卫性质的:1917 年在韦伯的心中,德意志民族国家的利益和安全比什么都重要。

确切地说,人们不应该夸大 1905—1906 年论文与 1917 年论文之间这种宽泛的区别<sup>3</sup>。至少从 1905 年以后,韦伯就深切意识到,在地缘政治上俄国国内的起义对德国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就在这一时期,韦伯对俄国那种有原则的自由主义一直都抱有同情,即使到 1917 年,他认识到自由主义萎靡不振的情况下,仍然如此。按照韦伯的说法,俄国立宪民主党人(Kadets)已经慢慢抛弃了俄国的自由主义,由于在

国内的失败与消沉,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帝国主义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尽管有这样一个判断,但据此认为在1905—1906年的论文中“最令韦伯忧心的问题是俄国的事件对德国发展的影响”(Marianne Weber,1988[1926]:328),是极具误导性的。这个判断(指玛丽安娜·韦伯的判断)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而不是韦伯论文成文的1905—1906年,而且它也使早期论文与晚期论文相互牴牾,因此很有可能是玛丽安娜·韦伯自己的看法。

在导言的剩余部分,我们首先描述了社会政治背景的概况与韦伯论文的内容(下面的两个部分)。考虑到1917年的论文主要是为了论辩,我们将集中讨论1905—1906年的研究,与1917年的论文相比,1905—1906年研究的实质内容要多得多。在以下章节中,我们试图更一般地定位关于俄国的作品在韦伯著作中的地位。然后我们会考察它们之于当下的政治意义。

### 1905—1906年的论文

“当代史”是所有叙事形式中最容易过时的。当前的报道可能会因其巨大力量带给我们震撼,然而一个星期以后人们就能证明它是错误的或者过分简单化了。因此韦伯在写作关于俄国的文章的过程中,无疑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韦伯似乎很少宣称什么;他认为1905—1906年的论文只是“编年史”,是“编排非常蹩脚的记录集合”,而不是真正的历史。另一方面,韦伯对俄国状况的考察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叙述;韦伯以一种不同于马克思对波拿巴的分析<sup>①</sup>,他试图揭示出什么对“总形势”是“重要”的(BD:113,第2个注释),以及总形势的趋势和动力(Scaff and Arnold,1985)。不管怎么说,从1905年进行尝试性分析开始,韦伯就以一种一丝不苟的节奏进行,力图与形势发展的步调保持一致,以身体允许的尽可能多的精力和可能得到的文件资料从事报道。

<sup>①</sup> 应指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译注

到韦伯全身心关注俄国之时,1905年的革命已进入谢幕阶段。1904年,正值日俄战争搅得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独裁政府焦头烂额之际,政府为了稳定政权,力图与自由改革运动取得某种和解,但尼古拉二世的政策朝令夕改。自由主义运动的核心是地方自治会(zemstvos),各省和各地区的地方自治会是俄国在1864年建立的(Samuely,1974:226)。地方自治会日益要求公民自由和能起作用的议会。从独裁政府的立场来看,地方自治会要求得实在太多了,从效果上看,独裁政府也没有理会他们的要求——1904年11月“第一次地方自治大会”的《十一条纲领》有力地阐发了这些要求。强大的压力已经形成。在“流血星期日”(1905<sup>5</sup>年1月9/22日),很多人在沙皇的冬宫外面请愿要求基本的公民权利、改善工作条件,政府军队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这加速了罢工和兵变的爆发,这场罢工和兵变断断续续经历了很长时间,从冬天持续到春夏。到2月底沙皇尼古拉二世做出让步,8月份再次让步,8月份的让步产生了所谓的布理金杜马。这个筹划之中的杜马允许有限的人民代表制度,并且这一代表制度要以一种政治区域选举制为基础,并给予以议员组成的下院以商讨与建议的权力(Doctorow,1975:124f)。然而这个让步完全没有遏制农村和城市的起义;筹划中的布理金杜马也胎死腹中。

10月,恐怖主义、农民暴动、武力兵变,还有乌克兰、波罗的海地区、波兰和芬兰等地民族主义者发动起义,再加上一次总罢工,这突如其来的一切终于迫使独裁政府作出了进一步的让步。后来列宁称这场革命为“在社会实质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斗争方法上是无产阶级革命”(Lenin,1967[1925]:790),面对这场革命,沙皇颁布了《10月17/30日宣言》<sup>①</sup>。这个宣言本质上承诺:“有效”的公民思想、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以签署一项人身保护状(Habeas corpus)汇编条款的方式来保证这些权利;加强人民代表制度;以及“永恒不变的原则”,即一切法律必须获得帝国杜马的表决同意。沙皇及其任命的总

① 又称《整顿国家秩序宣言》,由维特亲自主持起草。——译注

理舍基·维特伯爵试图借助这个宣言来分裂反对力量,分裂改革的自由派与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其他的激进人士。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宣言的条款以及后来作出的廓清获得了局部的成功(Doctorow, 1975: 135)。直到下一次对独裁权力重大挑战,也就是12月的总罢工以及随之而来的莫斯科武装起义出现之前,政府组织得更好了。政府凭借武力迅速镇压了12月的起义,并最终在新一年<sup>①</sup>的3月举行了杜马选举。

读者必须把这种大动乱带到《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这篇文章中去。这篇文章最初是用德文写成的,部头跟书一般长,它带我们回到了1905年12月。这篇文章的着眼点是考察一部宪法草案,这部草案出自有自由倾向的解放联盟(Union of Liberation)之手,它是由法律专家柯克斯金(F. F. Kokoshkin)和科特历尔热夫斯基(Kotliarevskii)起草的,在1905年12月之前以《俄罗斯帝国基本法》为名在巴黎出版。韦伯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第一句提到的“之前的说明”是指舍基·芝瓦格对这部宪法草案的评论;韦伯曾向《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递交了芝瓦格的文章,这份杂志是当时德国社会科学的主要刊物,由魏纳·桑巴特、埃德加·雅费与韦伯本人担任编辑。对于芝瓦格的评论,韦伯不只是附加了他曾应允的“少量评论”,而是详细考察了“自由与民主运动的担当者(BD: 41)、那些聚集起来反对它们的力量,以及正处在迈向西方式立宪道路上的俄国政治体制的前景。

韦伯丝毫不怀疑俄国独裁政府最终会败落。政权已经民心尽失,以至于在国内,与政权的“永久妥协”“没有任何实践的可能性”(BD: 5 74),尽管如此,很可能还是需要一场重大的欧洲战争来完成最后一击(BD: 142, 第200个注释)<sup>6</sup>。即便败落了,自由民主体制也不会自动取代沙皇政权。相反,农民地位的改善更有可能鼓励“共产主义者的激进主义”(communist radicalism, BD: 90)而不是自由个人主义。韦伯还考察了某些社会主义者的纲领与人物(众所周知的是列宁与普列汉

<sup>①</sup> 1906年。——译注

诺夫,但“社会主义革命者”帕斯克霍诺夫<sup>7</sup>更为重要,韦伯称这个人是一个现代雅各宾派),通过这样一次考察,韦伯觉察到了“存在一种令人担忧的预兆,也就是,在激进理论家的影响下,俄国很容易走上这条中央集权-官僚制的道路(centralist-bureaucratic)”道路(BD:89)。那么,自由民主的力量到底由什么人组成?在不久的将来,他们政治成功的机遇又是什么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韦伯十分明确地区分了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俄国资产阶级和作为一个地位群体的俄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俄国资产阶级,具有五花八门的资本家分裂成分(fraction),如巨大的产业、产品、金融资本等等,因而对自由立宪主义态度冷漠,或者(也更为常见)在政治性情上明确表示不友好,甚至持“反动”态度(BD:74)。相比之下,作为一个地位群体的资产阶级则是自由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事实上是“对生活持有某种一般态度并具有一定教育水准”的资产阶级(BD:45)。作为一个地位群体的资产阶级是由地方自治会中无薪的(honorary)<sup>①</sup>、有地产的成员(所谓的第二要素)、解放联盟的成员以及立宪民主党(成立1905年10月)的成员组成的,而立宪民主党本身就脱胎于地方自治会与解放联盟,这群“名流”力图以法治国(Rechtsstaat)为导向,也就是基于法律统治的国家<sup>8</sup>,来推进俄国政治生活的现代化。此外就是第三要素,也就是“地方自治会领薪工作人员中的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学校老师、农艺人员、统计人员、记者、医生以及护士,第三要素与这群名流保持着某种紧张关系,与他们出身世家贵族的地方自治会同僚相比,第三要素的世界观在性质上更具有左派分子与民粹主义的色彩,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更接近于被统治阶级(BD:45,71;PD:242;参见 Perrie 1972:125)<sup>9</sup>。

韦伯以不同的理由赞扬了地方自治会中的这两大群体。更为重要的是,在韦伯看来,地方自治会作为一个设置整全的机构,最有力地驳斥了一种信口开河的观点,这种观点声称俄国是一个还没有准备好

① 此处的 honorary 字面意思是荣誉的,不领薪的,从韦伯正文中对第三要素的讨论,可以看出荣誉的主要意思是不领薪,因为第三要素是领薪的,所以译成“无薪的”。——译注



自治的社会。地方自治会在教育、卫生健康、道路建设、税务评价等领域,以及在其他领域的治理成果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考虑到这些成果是在中央官僚机构咬牙切齿的反对中做到的,就更让人铭记于心。韦伯就俄国的地方自治会和美国的地方政府进行了赞许性的比较,他预见到作为一项制度的地方自治会,在其萌芽时期就预示着一个扩大的自治体制会遍及整个俄罗斯帝国。然而,让人特别痛惜的是,解放联盟的宪法文案没能充分利用地方自治会的潜能。诚然,这种遗憾在立宪民主党更具有联邦主义色彩的纲领中找到了一些补偿(BD:49)。但是即使是立宪民主党的纲领也要以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为基础,民族问题是一个巨大的漩涡,它威胁着把全部的联邦规划都变成民族充分自治的要求,在当时只有个别自由派人士能心平气和地接受这样一个未来。

根据韦伯的观点,地方自治会在双重意义上为俄国的自由主义准备了条件。一方面,地方自治会提供了一个自由派可以合法鼓动变革的场所。另一方面,有一个长期的地方自治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承担着准备自治会大会的议程和设备的职责,它为自由观点的游说提供了一个持久、长期的工具。尽管如此,在《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中,韦伯关于地方自治会知识阶层的分歧、自由宪政纲领的局限性,以及民族问题的一些症结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很早就以一个悲观的预测为基础:自由民主在革命中成功的机会微乎其微。自由派本身有限的支持者以及它努力的方向只是一部分原因。某些重要的历史条件也对立宪运动不利,这一点我们还会加以讨论。各种各样的固执己见和势不两立,使自由派联合那些与国家政权关系密切的群体,或者反对国家政权的社会阶级的能力也大打折扣。

可以预见的是,中央官僚制度的古老卫士(old guard)必定会厌恶自由派。教会也不会给予他们丝毫的支持。总的来说,教会的制度性利益和信仰取向使它成为独裁制的铁杆支持者,并因此对变革百般阻挠,只是在重要的例外时才会赞成变革。自由派在更广阔的社会层面上也没有任何坚实的支持力量。显然,各大社会主义政党是沙皇的死